

中文版序言

我的这部传记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作者看来,每一位读者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要,但是,中国读者在我心中(我还要加上一句:在我的感情世界里),占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这一特殊位置最初是因为我的个人经历而慢慢形成的。1985年,我非常荣幸地应邀参加了在长江巴山轮上举行的国际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学家同行邀请了七位国外经济学家谈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这让我有机会可以就中国的改革前途发表自己的观点。打那以后,经济学家们谈到改革问题时,仍然常常会提到那次“巴山轮会议”。

不久,我的《短缺经济学》在中国出版了。在改革之前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通常长期存在食品和消费品以及生产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极度短缺。沿袭该书的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短缺并不是计划制定者错误决策的结果,而是体制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一体制不断再制造着短缺经济。我的中国朋友再说,他们可以用我在该书中提出的逻辑,批评官僚集权体制,批评僵化的计划指令体制,并倡导市场化改革。当时,我的所有著作只有这一本拥有众多的读者。

此后,我的著作在匈牙利文版或者英文版之后,很少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后来我又数次访问中国,所到之处尽是赞赏和欢迎之声。对我来说,所有访问都是伟大的智识体验(更别提那些文化、艺术和旅游胜地以及美食了,感谢东道主让我享受到了这一切)。在我访问中国各地的时候,无论身处何处,总是与政府官员一起还是与政府官员一道,他们

我又获得了人们的褒奖和认可；前段时间我还拥有天真的信仰和毫无来由的热情，之后又以怀疑和失望。当然，在我没那么天真、思维更加缜密后，我又形成了新的信念。通过重新学习和不断积累，新的、更可靠的知识取代了不成熟的知识和错误的思想意识。

我的生命之舟一会儿荡漾在宁静的水面上，一会儿又跌宕在暴风骤雨中，好几次，船儿几乎就要搁浅，而海上风暴又起。比如说，自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成立那天起，我就在这家重要的国际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直到它关门的最后一天，整整工作了20年。后来，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份教职，使得以继续我的研究和教学。再度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并非易事，但我愿意尝试。

由于我已经有了定向的指南针，所以尽管在暴风雨中趑趄而行，我仍然可以看清道路。

我不能说自那时以来，我的政治观点一成不变。读者从我的传记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从1953—1957年，我的政治信念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重大改变。但我仍然坚持我一贯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原则，这一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原则，深植于我的政治立场之下，并界定了我的思想范围。当我惊讶地认识到，我盲目信任过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无情地违背了我的基本道德原则的时候，我改变了自我的政治信仰。

过去我竭力持守并希望将来仍然坚持的是哪些基本价值观呢？

如果有可能进行排序的话，我要把自由的理念和对人权的保护放在首位。我的第一部专著《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中，我关注的是自主抉择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中央政府要事无巨细地干预一切呢？为什么不给生产企业留下一点必须独立性的呢？如我提及的那样，在我撰写《短缺经济学》的时候，我把这当作狭义的经济学问题而未予考虑。短缺限制了个人抉择的可能性，它迫使人们永远不能自由地行使能动性。自那时以来，我总在我的书中强调这样一个意愿：尽可能放手让企业自由吧。这样，人们就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在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学科和专业之间，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雇主之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自由进行选择。

我的人生道路上，休戚与共这个概念一直伴我前行。很多事情都可以在这个概念中找到。我很幸运，我出生在一个家境小康的书香门第，不过，我非常同情那些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人。虽然除了战争期间以外，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滋味，也从未亲手头拮据，但我至少认真考虑过饥饿和拮据对穷人

总是一次次对我说：“我是你的学生。”对此我总是从心底里感到自豪。一个以写作和教书为生的人听到这些话，能不深感荣耀和喜悦吗？正如读者将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我知道自己在中国有着可以信赖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关心我的命运，在意我的言论，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真正的朋友；我也关心他们的命运，在意他们的言论。

我非常希望我的这部传记能在中国找到知音。我希望多数读者都能感觉到：他们与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思想和情感的联系。

事实上，中国和匈牙利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有13亿人口，匈牙利的入口却只有1000万，只抵得上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人口。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匈牙利的历史则比较短。两国有着不同的传统、习俗乃至不同的文字，种种不同还可以不断续写下去。当然，两国之间也存在重要的联系。

中国和匈牙利都熟知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规律，我在书中将这种体制称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匈牙利是最早对这一体制实施改革的国家。那时候，渴望进行体制改革的中国经济学家，非常希望看到为匈牙利改革奠定基础的那些理论和实践。1989—1990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匈牙利与其他几个东欧国家一样，加快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这与中国的转型过程颇为相似。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读者即将读到的这部传记的背景，我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这背景下展开的。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中国读者同样熟悉的历史背景，是他们曾经的生活，也是他们未来的生活。

但是，我们不仅是在个人生活之外部环境的发展中，而且是在历史经验中找到了这种相似性。传记是一种极为个人化的文体。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但我还是非常肯定，我生命中的这些经历也是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熟悉的经历，他们会从我的经验、我的处境以及我的选择中，看到他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选择。

在我踏上艰难而又激动人心的思想探索之旅时，我还很年轻。此刻，在撰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是84岁的高龄了，但我依然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从事研究，发表文章，出版专著，指导学生。中国有尊老的古老传统（在我的祖国匈牙利，也普遍遵守这一传统），因此对读者来说，花一点时间关注一个老人涵盖四个世纪的经历，或许还是值得的。

我这一生都在历险。有段时期我身处危险之中，命悬一线，当然我也有和平与宁静的日子；有段时期我饱受迫害和威胁，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忧伤；有段时期

意味着什么。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虽然对人们从困境中崛起需要做些什么的看法有了改变，但我仍然认为，我有责任为此做点工作。

我一贯重视为祖国效力。在我这本传记的匈牙利利文版面世的时候，当代伟大的匈牙利文学家彼得·纳达什说我是“匈牙利爱国者”。我认为这种说法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肯定。我是一名犹太后裔，我的父兄都在大迫害期间身亡，我的生命也遭遇了危险。许多有同样痛苦经历的人离开了祖国。再后来，移民潮一波接一波，1956年革命失败之后，仅仅几个星期内就有2.5%的匈牙利人离开了祖国。几十年后，当柏林墙出现了裂缝，尤其是这堵墙倒塌之后，很多人跑到富裕国家寻求更富足的生活。发达国家为穷国的才智之士提供的大好机会，触发了“人才外流”的大潮。我非常理解那些出国寻求发展的人，但我自己选择的是另外的道路。虽然我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在美国的一流学府哈佛大学执教18年，但这期间我无数次回到匈牙利。我一直保留着匈牙利公民的身份。居住地和法律关系固然非常重要，但个人的认同感至少同样重要。我是匈牙利人，在我为祖国而骄傲的时候，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超然于一国国民之上。但我已经摆脱了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摆脱了对不同面貌和肤色的人的偏见。我强烈谴责有害的民族主义。我认为自己是一名“世界公民”，同时又是一名欧洲人、匈牙利人以及犹太人。这是我在生命的播迁中始终坚持的道德原则之一。

尽管经济学领域依然一成不变，但我的经济学思想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希望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演变）。自从对正统意识形态深感失望以来，我已经养成了一种健康的怀疑心态。我不会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任何人说出任何话，不管他多么位高权重，我总要问自己，他说的是真话吗？也许他说的是真话，但他说错了吗？如果我在理论上产生了哪怕一点点怀疑，我都会用实践来对照理论，用日常经验而不仅仅是用统计数据来对照理论（这种对照其实也很重要）。这是防范教条式思维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的生活环境和对日常问题的看法已经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改变了多次，但是——我希望别人也同样看到——我的行为方式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一直努力坚持我为自己设定的行为规则。最重要的一个律令就是：一个人的言论和文字必须求真。人不能说谎。如果出于什么原因，我无法说出全部事实，那么，虽然我说的是真话，但因为还有部分事实没有说出来，我依然会为此而感到苦恼。读者将会在我的传记中看到我在这一方面的一些想法。

中国和匈牙利惨痛的历史经验曾经亵渎了“自我批评”这一概念。在我们这

两个国度，人们会迫于侮辱甚至严酷的身体暴力而违心地进行自我谴责。但不论自我批评怎样被败坏了声誉，我们还是需要进行自我反省。这不是出于外部的影响，而是出于良心或冷静思考的命令，这样的反省我进行了多次。我努力审视我早年生活中的行为以及指导我行为的思想意识。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我就会与这些行为和思想意识决裂。这时候，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人们自怜或谨小慎微，这样就有可能保留过去的许多错误观点。如果你照镜子时不把昏暗的灯光擦亮，就只能看到镜中模糊的面影。就像一首美国歌曲唱的那样，当美国青年开始从恶习的噩梦中觉醒，开始摆脱误导人的传统，那么，“让阳光照进来”。

我要感谢所有帮助我、使本书得以摆在中国读者面前的人。我要感谢出版木书中文简体字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我还要感谢安佳教授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我非常激动地期待着来自中国的思想回应。

Imre Kertész

2011年10月21日于布达佩斯